

中国最佳散文.

2002

序

II

III

去年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完成《2001 中国最佳编选工作是硬着头皮交了一道“难题”的话，那么，给我们出的题就更令人挠头了：不仅要选 2002 年度文，而且还要选这一年度的最佳随笔。且不说这一年多少散文随笔面世，如何尽量避免遗珠之憾的这一关更难受的则还在这散文与随笔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所杂文的任务交给我们，否则更乱）？何谓散文？何谓随么要将此篇纳入散文，将彼篇归入随笔，依据何在？依据似乎根本就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循。

西方文论中，恐怕压根就没有所谓散文、杂文一说，它的相近概念就是“ESSAY”，中文通常译作“随笔”。解释是“一种中等篇幅的文章，通常为散文体。由于随繁多，因此对该文体下定义非常不易。”既然“不只好简单回溯一下“ESSAY”的发展史，就不难看出它的东西有多庞杂。一般认为，“ESSAY”一词为 16 世作家蒙田所创造，意思是“试图”。这种文体早在 16 前就以正式或非正式的作品形式存在，但蒙田深沉、率切文字为私人随笔创立了标准。此后，培根的随笔比几乎成了箴言集。18 世纪艾迪生、斯梯尔、约翰逊、德斯密斯等均将随笔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要文体。19 世海成为一位伟大的随笔作家，他善于观察的风格使其作

品既有幽默、幻想，又富于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到19世纪末，史蒂文森的随笔赢得了与蒙田和兰姆同等的地位。20世纪，随笔愈加繁盛，涉及内容包罗万象；到了它的下半叶，“ESSAY”则开始逐渐消失，但在后来被称为专栏的形式里仍然存在。

我国的文论中对此倒是有看似不同的解释。权威的《辞海》称随笔为“散文的一种。随手写来，不拘一格的文字。”而散文则是“文学的一大样式”，“其中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散文包括杂文、小品、随笔、报告文学等在内；狭义的散文则专指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情思的叙事、抒情散文。散文形式自由，结构灵活，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或三者兼有。”这样的解说不能不让人对散文与随笔的区分仍然一头雾水，这也可以，那也可以，无异于什么也没限定，什么也没说。叫人如何依从它？

既然东西方均无现成答案可循，那也就只好自我“创造”，自我划分，“自成一家”了，从这个角度看，也好在散文与随笔的编选集我们一身，这样似乎更便于“宏观调控”一些。

因此，在我们的这两个选本中，大体上依循着这样的标准在划分散文与随笔：富于形象、侧重情感、工于叙事者多入选散文卷，而长于感悟、偏于理性、多发议论者多入选随笔卷。即便如此，要将散文与随笔的界线划得一清二白，还是十分困难，因此，读者在我们的这两个选本中多少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界线未必那么清晰、彼此交叉互渗的篇什。也就是说，某些篇什既可入选散文卷，也可入选随笔卷，现在的这种安排完全是我俩的自说自话，没太多的道理可言。这当然是一种无奈，而且这种无奈大约也是一时无法消解的。

二

不过，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切分着散文与随笔的界线，它们之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近亲”关系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换言之，撇开体裁界线不论，仅着眼于为文之道，两者同样存在着一些共通的特点，这就为我们在挑选入集作品时提供了另一套选择标准。

无论是散文还是随笔，它们的写作大约都无法摆脱如下一些基本要素，诸如情、识、散、工、力、闲、大、小等等，而这些要素大概齐也可以归为四组，即情与识，散与工，力与闲、大与小。这当然是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范畴的要素的排列组合，情与识侧重于内容，其余三组则偏于走笔，而内容与走笔又存在多种组合的可能。因此，在这些要素以及相互间的组合上，并非只是简单的价值上孰高孰低的关系，无论您是着眼于情还是用力于识，是散淡不经还是工于格式，是走笔千钧还是闲适飘逸，是博大精深还是小巧玲珑，其实都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使之组合得更加浑然天成，愈发自成一体，最终自成为独特的“这一个”。

从入选的这些散文随笔来看，在处理上述要素及要素间的组合上都见出自己的一些特色，在一定层面上也代表着近年散文随笔写作的一些基本走向。比如情感的抒发更加生活化与细节化，以往那种矫饰的、人为的煽情在时下散文随笔的写作中已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比如识见的阐发益愈走向纵深与文化，那种肤浅的一事一议或无病呻吟式的几声叹息已越来越没有市场；比如散文随笔写作中的种种争论或口号招牌的提出已越来越激不起多少涟漪，取而代之的是务实的写作，前几年热闹一时的所谓“大散文”、“小女人”、“行走”之类的“大旗”下不再是人头攒动，在务实的写作者那里，这些口号与大

旗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可言。何谓大?何谓小?何谓工?何谓散?何谓闲?何谓力?即使我们在理论层面将它们一一辨析得十分明白,最终也还得落实到写作者的写作之中,最终还是离不开写作者心灵的博大与情感的率真,否则就会出现一大批矫饰之作、模仿之作、匠人之作。以往我们讲“惟陈言之务去,”此言用在散文随笔的写作上,或许可以改成“惟矫情之务去”。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选编这两本年选的过程中,固然有免不了因自身阅读局限而造成的遗珠之憾,但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们虽然尽可能地照顾到所谓题材与手法的多样性,但更重要的取舍原则还在于守住情感的真切与心灵的博大这两条底线。因此,在入选的这些篇什中,无论是情感的抒发还是识见的阐释,无论是现实的记录还是往事的追忆,无论是发古之幽情还是见洋之感慨,无论是读书之孔见还是观事之感悟,题材可以五花八门,手段可以玲珑满目,而且也尽可能在往丰富里挑选,但情之真与心之大则没商量。由是观之,在这两本年选中的一些篇什,尽管可能挑出其不够精致、不够娴熟、不够老到、不够……之类的毛病,但从作者笔尖透出的那份率真的情感往往令人感动,回味不已,灵动的笔法激发你阅读的快意,理性的思辨带你进入思考的乐园……读文章能有如此效果,足矣!

三

有必要对这两个选本编选过程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略作说明。

在选编过程中,一些作家给我们来函来电,提供作品,使这两个选本增色不少,在此,向他们表达诚挚的感激之情。

对入选两个选本的作家,我们大都以不同方式征得了他们

的同意。但有少数入选作品的作家，因我们孤陋寡闻，尚未及时与其取得联系，只是又不忍割爱，故冒昧将其大作选入。在此，我们要向他们深表歉意。这些作家见到该书后，请及时与出版社联系。

两个选本中作品的顺序排列，大体依其内容的相近而相对集中，而同一内容中先后顺序则完全凭我们个人的阅读习好而定，这也算是一种见仁见智吧。

需要重申的是，由于我们阅读所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见谅。好在每一位读者本身就是一位编选者，在他们平时的阅读积累里，也会有自己心目中的散文随笔最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选本只是提供了一种参考。如果来年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完成选编这道难题的话，希望能少一些这种遗憾。

2002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序..... 王必胜 潘凯雄(1)

袁 鹰	秋山红叶青龙桥	(1)
铁 凝	四见孙犁先生	(6)
丛维熙	荷香深处祭文魂	(12)
崔道怡	你与黄河同在	(21)
周大新	冯牧先生	(26)
董保存	彭德怀元帅和《欧阳海之歌》	(31)
张抗抗	遗墨摩挲泪几行	(40)
高尔泰	常书鸿先生(节选)	(48)
汤世杰	最后的人性的李乔	(52)
叶兆言	王伯祥·顾颉刚	(55)
翟永明	林徽因在李庄	(63)
王中才	又见白羽	(70)
陈 村	去找史铁生	(80)
刘心武	仁瓜俩枣	(83)
高 莽	翻译家草婴其人(节选)	(86)
贺捷生	老迈和他的书	(95)
高洪波	美林的世界	(101)
蔡 翔	三年生死两茫茫	(104)
刘 茵	好人高贤均	(118)
蒋子龙	六十岁真好	(126)
李国文	茶酒篇	(133)

余 华	父子之战·····	(139)
莫 言	陪考一日·····	(143)
吴冠中	母亲·····	(148)
衣向东	躲在信纸背后的父亲·····	(152)
阎连科	感谢祈祷·····	(155)
陈映实	幸福着女儿的幸福·····	(159)
周 涛	狗狗备忘录·····	(164)
陈今越	一只叫安的狗·····	(175)
庄 洒	我和鸟儿有个约会·····	(179)
余秋雨	苍老的河湾·····	(184)
邵燕祥	踪迹前尘(节选)·····	(204)
叶 楠	赶年·····	(217)
毕四海	生命的故事(二题)·····	(221)
陈 染	家居琐记·····	(227)
柳 萌	关于雨的记忆与怀念·····	(232)
张承志	吊瓶子·····	(241)
于 青	北京布鞋·····	(245)
张立勤	一直下雪·····	(250)
李存葆	国虫(节选)·····	(257)
胡廷武	听蝉·····	(289)
萧春雷	虫子们·····	(309)
王 蒙	印度纪行·····	(320)
朱秀海	三重印象下的俄罗斯·····	(333)
史铁生	想念地坛·····	(345)
贾平凹	通渭人家·····	(350)
梁 衡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357)
何向阳	长河行·····	(366)
刘继明	一个人的武汉·····	(380)

刘 齐	吾们沈阳人·····	(390)
阿 成	走进哈尔滨·····	(398)
素 素	模仿的大连·····	(410)
范小青	苏州园林·····	(420)
陈 燕	广州，广州·····	(429)
林 白	云在天边·····	(434)
于 坚	伤心虎跳峡·····	(441)
廖 奔	丽江风韵·····	(449)
庞天舒	昭君的草原·····	(471)
刘元举	去往大昭寺的那几个日子·····	(477)
巴音博罗	吉祥蒙古·····	(486)
陈世旭	庐山思绪·····	(490)
余光中	泰山一宿·····	(495)
叶延滨	圣地(节选)·····	(504)
迟子建	鲁镇的黑夜与白天·····	(511)
韩静霆	消失的范家石坊和永生的骑马童子·····	(516)
王充闾	亲近泥土·····	(521)
刘亮程	库车(节选)·····	(527)

秋山红叶青龙桥

塞外来的秋风吹到长城边，仍挟着阵阵萧瑟的寒意。山坡上几处红叶点染着落寞的秋光。灿烂夕阳下，冰心和吴文藻两位老人的塑像依偎并立在一个小山头上，依然是那么和蔼慈祥，脸上依然挂着永远的笑意，引起人们温暖的怀思。

怀思。是的，这里正是长城华人怀思堂的一角：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同他们两位在一起的，是他们生前共同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朋友叶圣陶、茅盾、徐悲鸿、田汉、夏衍和曹禺。这几位老友，都已先后离她远行。徐悲鸿先生早在五十年前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猝然病逝。田汉遭受林彪江青一伙摧残凌辱，1968年冬惨死狱中。茅盾1981年辞世，距今已二十年。叶圣陶老人1988年以九二高龄仙逝。就连仅仅比她小半个月出生被她称为小老弟的夏衍，比她先走五年。下一年，比她年轻十岁的曹禺相继病逝。说到她那位患难相依、哀乐与共大半生的老伴吴文藻，也早在十五年前驾鹤西游。而今天，他们都来到这个长城脚下的怀思堂，老朋友重又聚首了。泉下有知，执手相看之际，不知是悲是喜？是微笑还是流泪？

我肃立老人塑像前，望着渐渐远去的长城雉堞，禁不住遐思绵绵。长城脚下不远处，便是青龙桥。冰心妈妈——让我再叫一声妈妈吧——您还记得青龙桥吗？您还记得您第一次来到青龙桥所写《到青龙桥去》那篇散文的往事吗？

整整八十年前的1922年10月，在“双十节”假期，避开北京城到青龙桥去。一路上，她看到的只是无际的苍黄色的平野，和连接不断的天末的远山，不时有很浅的浓绿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那时的火车开得一定很慢，所以她能看清“山半

柿树的叶子，经了秋风，已经零落了，只剩有几个青色半绿的柿子挂在上面”。这般景色虽然比不上江南，也同她童年时代熟悉的大海壮观迥异，但也还是一派北国风光吧。但是青年女作家并没有着意渲染雄伟的长城和沿途的风景，却用相当多的笔墨叙述列车上见到的铁路稽查和几个未打票的普通兵丁之间的细小的交涉和对话，使她“周身起了一种细微的战栗。——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回想，呀！竟是最深的惭愧与赞美！”

针对当时一般文学作品中通常对军人形象大都做粗野、残忍甚至有点疯狂的描写，“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二十二岁的冰心感到深深的不平。她直率地呼喊：“文学家呵！怎么呈现在你们的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

她从小生活在当海军将领的父亲身边，周围是辽阔的大海、平静的海港和质朴的海军官兵。她熟悉他们，了解他们，或者说，她爱那些大多来自城乡平民的普通兵丁。所以她充满同情地写道：“也讲一讲人道吧！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们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笳声中度生活。家里的信来了：‘我们要吃饭！’回信说：‘没有钱，我们欠饷七个月了！——’可怜的中华民国的青年男子呵！山穷水尽的途上，哪里是你们的歧路？……”

我抄录这一段文字时，心中禁不住一阵战栗，八十年前，一位出身名门的年轻知识女性，能如此细致入微地关注同情于那些为北洋军阀驱使卖命的普通士兵，不能不感佩“五四”时代弘扬人性、人道和人权精神的闪闪光辉。惭愧的是，青少年

时代读此文时，对占了一半以上篇幅的这些内容，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我调到北京工作后，也曾不止一次登长城，乘火车到青龙桥站下车，瞻仰詹天佑铜像。虽然脑子里也闪过《到青龙桥去》那篇名作，却已记不起文章的内容。

1959年秋天，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作为我服务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有幸陪同冰心妈妈再去一次青龙桥，邀约她写一篇《再到青龙桥去》。这类出题作文的事，对作家多少有点不尊重。但是冰心妈妈欣然允诺，她说早就想找机会再去一次青龙桥，看看那里今天的新面貌。金秋的一个清晨，我和同事李叔方一早就到冰心先生寓所，接她赶往西直门车站。我们再三向她致歉，由于汽油紧张，不能用小轿车送她，只好乘火车。她再三摆手说：“不用不用，那一年是坐火车，这次也得坐火车。”

到青龙桥站下车，已近中午，按冰心先生的主意，也按当时出差采访习惯，先到派出所，打听到生产队长李景祥的住址，就直奔他家。李景祥一家正准备吃饭，看见小院里突然进来三位不速之客，不免有些惊讶。我们连忙向他道歉，说明来意，便盘腿上炕，同他娓娓交谈。冰心先生从他一家妻儿生活问起，又问到生产队的发展，一边细细地问，一边不停地记，就像走亲戚似地叙家常。那位年岁不大的质朴的基层干部虽然听到我们的简单介绍，可能始终也没有弄清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细声细语的老太太是什么人。他讲得实实在在，讲生产队的成绩，也讲目前的困难。既不夸夸其谈，像那些年我见到的一些县乡干部那样，也不忸怩作态。冰心先生很满意，对他印象很好。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她看看手表，看时间不早了，回头对我们说：“我们告辞吧。不要耽误他们吃饭，更不要耽误他的工作。”出了李景祥家门，她还恋恋不舍地一再回头。看到溪边小桥下有个穿粉红褂子的姑娘正在洗衣服，笑笑对我们说：“你们看，小桥流水人家，多美的一幅画面！”冰心先生

是性情中人，她在生活中随时会发现美。

在一个小茶馆里吃了点简单的干粮，我们又陪她登上长城，经过一处处堞楼，她不住地向远处凭眺塞上秋光，心情极畅快，一点不觉得累，还不时回头对比她年轻二十多岁的副刊编辑李叔方说：“你身体好像有点弱，慢慢地走吧！”

回来后没有几天，她就寄来《再到青龙桥去》。盛世文章，又值十年大庆，笔下自然摇荡着欢乐的气息，不复有三十年前的凄凉和感慨。就如她后来在文章中开始写到的：“这一天，我被喜悦温煦的空气所包围，所笼罩！”她说不是“寻梦”，也不是“访旧”，而是“满怀着热烈的希望，去迎接那扑面的盈盈的喜气的！”

文章里，她写了张灯结彩、花卉缤纷的西直门车站、车站上梳着双辔的售票员和车上拿着蝇拍笑嘻嘻的来回招呼的乘务员，写了田野里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写了生产队长李景祥，也写了一大队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风貌，同她三十年前第一次乘车去青龙桥的几位女大学生完全是两代人了。文章结束处她写着：“……看着他们滚珠似的来往，尽情地欢笑，我虽然在一旁静坐着，我的心情却和他们融在一起。我的心默默地在向着他们呼唤，向比他们更年轻更幼小的人们呼唤：“让我们都多加一把劲吧，将来和平幸福的世界是我们的！”

近看长城上下欢欣踊跃的青少年，远眺碧绿碧翠的山峦，还从重山叠岭间的缺口看到水光掩映的官厅水库，她沉浸在一片欢乐和美好的情绪中。那时候，谁会料到仅仅六七年后，会遭到一场突如其来、旷世罕见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直席卷全国、连续肆虐十年的黑色风暴呢？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长城比以前更加雄壮辉煌，青龙桥也一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光。李景祥今年该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再到青龙桥去》发表后，我记得曾经给他寄过一份报纸，地址是延庆县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青龙桥生产队，不

知道他收到没有?他的一家都好吗?还能记得四十五年前到他家做客的那位老太太吗?他也许记得,也许早已忘记。但是他决不会想到,这位老太太如今正安详地站在离青龙桥不远的一个小山头上,望着迤逦秋山,萧疏红叶,迎着艳艳的朝阳,微笑地望着她所热爱的山河和同胞。她那纯净的品格和博大的爱心,将永远与秋山红叶同在,与长城同在,与青龙桥同在。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12月

四见孙犁先生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16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社做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

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讲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

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做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忍